

會議回顧

參與IDIERI 10的觀察和反思

第十屆國際教育戲劇研究所(International Drama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2022年07月10-15日 · 英國華威大學

今年七月，我到英國華威大學參加了第十屆國際教育戲劇研究所(International Drama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下稱IDIERI 10)這國際會議。本文分享個人在當中的觀察和反思。

我從會議最後一天說起。在閉幕禮上，主持人邀請1995年在布里斯班參與過首屆IDIERI的朋友站立，然後請第二屆的參與者(卑斯省，1997年)加入站立行列，如是者，一屆一屆的參與者加入——俄亥俄州(2000)、北安普頓(2003)、牙買加(2006)、悉尼(2009)、利默里克(2012)、奧克蘭(2015)、新加坡(2018)，最後是本屆高雲地利(2022)的參與者，十屆「校友」共同見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接棒籌辦下屆會議(2025)。我用「校友」來形容大家，是因為IDIERI以「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來定位，十屆會議雖由多國不同院校主辦，卻形同一間國際研究所，匯聚來自世界各地的實踐者和學者一同研習交流，無論是教授抑或研究生，是經驗豐富抑或新進的戲劇教育／應用劇場實踐者，皆聚首發表研究，提出討論議題，互相切磋。

首屆IDIERI的召集人Philip Taylor這樣解釋為何刻意選取「研究所」的字眼作為會議的名稱和定位：

「研究所」意味著這個機構能產生和促進教育的進步，是一個可以探究意念、提出新願景的地方。一間研究所可以成為引路明燈，讓新的理解衍生，讓陳規定型的觀念受到挑戰，讓新的開始得以展開¹。

(Taylor, 1996, 頁x-xi)

以「研究所」的觀念去看IDIERI，它是一個「共同學習的場所」。這

個場所在全球經歷數載大瘟疫後，更形可貴。在會議首天再次跟同行親身接觸，我寫下這樣的感受：「我們就像一班過去幾年只能上網課的同學，終於重返校園一起學習，重新連結，並分享別來這段日子大家分別學習了什麼。」

2019冠狀病毒病固然為戲劇教育工作者帶來無限挑戰；出於社交距離的需要，素來重視實體交流的戲劇實踐紛紛需要搬到線上進行。然而這些挑戰也為戲劇研究帶來新的課題，在IDIERI 10發表的演說、論文、研討會、工作坊，不乏從疫情觸發的討論焦點，例如創新科技在戲劇中的運用，疫情帶來的焦慮、疏離如何以戲劇／劇場手法處理，社區劇場參與者如何敘說疫情故事，觀眾如何接收疫情下的演出等。然而更多發表內容之關注點超越了對疫情的回應。來自廿多個國家的參與者，就著大會主題“Navigating mess and complexity in uncertain times”（在充滿不確定的年代中應付混亂和複雜），提出戲劇教育／應用劇場如何應對氣候暖化、身份認同、公民與民主、去殖民化、難民與移民、性別與跨性別、心靈健康……等各個議題，關注着我們的工作如何回應當下世界的迫切議題。

會議進行幾天後，一位參與者向我說：「聽過好幾場主題演講後，我發覺學術研究並非我想做的事情。」我作為一個實踐研究者，在重視研究的IDIERI會議中聽到一位年輕應用劇場工作者這麼說，實在無法不感到擔憂。我理解這位朋友是覺得好些講者予她「離地」的觀感，令她感到研究與實踐有着很大距離。然後，在某場演講中，一位台下觀眾也說了這樣的話：「此刻我們在一所大學的演講廳內討論社會，但想想此刻在烏克蘭發生的事，在香港發生的事，我們如何把我們的工作與這些事情連結呢？」我不禁感到困惑；台上的講者許多都是我認識多年的人，我深知他們的工作都有切實地回應社會，但為何當內容變成會議演辭或研究論文後，發表出來會予人離地的感覺呢？到底要用怎樣的話語和論述方式，才能打破「研究與實踐對立」這個錯誤印象呢？此外，我更尤其關注到如何讓更多實踐者感到可以在IDIERI這樣的平台中發表實踐心得。特別在亞洲，研究氣氛未及歐美澳加等地成熟，如何可以促使這裏更多實踐者做發表呢？誠如IDIERI前召集人Prue Wales和Charlene Rajendran所觀察：

〔IDIERI須納入更多〕實踐者，他們不是正式做研究的，但做出來的結果與正式研究很相似……在大部份國家，大學並無開辦我們這個領

域的課程，所以我們須要正視來自這些國家的人，考慮誰是適合參與 IDIERI 的人選。我們得把進行非正式研究的人包括在內²。(Turner-King & Kitchen, 2022, 頁15)

本屆 IDIERI 因防疫政策影響，來自亞洲的與會者不多，亞洲的發表人更是寥寥可數。然而即使在歷屆會議所見，來自亞洲地區的發表都是佔少數。在我個人參與學刊編輯工作中亦觀察到，我接觸到的許多出色的實踐者，都是鮮有在學刊、學術會議中做發表的。是這些平台的門檻過高嗎？若然，要用什麼方法才能有效幫助他們跨過這些門檻？抑或是他們看不到發表的價值？還是在當今新媒體發達的年代，我們需要更多文字、論文以外的發表形式？要用什麼形式才既維持學術嚴謹性，又保存實踐的實在感？這些都是我仍在尋找答案的問題。

最後想談一個關於身份的問題。IDIERI 10 其中一些演講，講者都明確地展示出他們自身的身份如何引領他們的研究和實踐。在 Daniel Harris 和 Dirk J. Rodricks 的聯合主題演講中，Harris 論及其性別身份如何帶來「跨男性」的研究手法，Rodricks 講述其種族身份如何帶來「批判性去殖民化」的研究思維，Urvashi Sahni 在另一場主題演講中，娓娓道來她在作為一個印度女性的成長經歷如何影響她成為一個女權運動家與教育家，其演講更切實體現出她的存在 (being) 本身就是其信念與實踐。「你的自身就是你所教的」這個觀念，我素來深信不疑，但為何此時再度觸動對問題的深思呢？我猜是跟自己的身份轉換有關。從香港移民英國後，換了一個工作場域，重新探視自我文化身份，這將會怎樣影響我的應用劇場實踐呢？這個關於身份與實踐之關係的問題，非但是跟我一樣移居海外的同行同樣要思考的，相信對每位戲劇教育／應用劇場實踐者來說，都是值得內觀與探索的。

注釋

- 1 由筆者將英文原文翻譯成中文。
- 2 由筆者將英文原文翻譯成中文。

參考文獻

- Taylor, P. (Ed.). (1996). *Researching drama and arts education: Paradigms and possibilities*. Falmer Press.
- Turner-King, R., & Kitchen, J. (2022). Convening the International Drama in Edu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IDIERI) Conferenc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Applied Theatre Research*, 10(1), 7-19. https://doi.org/10.1386/atr_00059_1

陳玉蘭

陳玉蘭應用劇場工作室 · 英國

電郵：catlab@protonmail.com